

## 多维视野下西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

同 美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明确西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 不仅要重视吐蕃王朝或者更晚时期的资料, 而且要更加广泛地关注象雄王朝时期的所有资料, 包括辛饶米奥切的子孙后代在内的其历代追随者以及相关人物、事件、寺庙、文物、教义、教规等等。只有从多学科、多角度观察分析才能使我们研究的内容更加清晰。

**关键词:** 多维视角; 西藏本教; 起源发展

**中图分类号:** B9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11) 06-0045-08

西藏本教是藏族的本土宗教, 它最能反映藏族文化的特点。长期以来, 藏学界非常关注西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西藏本教发祥于何时何地、具有何种特点、出现过哪些相关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

### 一、西藏本教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回顾

关于本教的起源有外来说和本土说等典型观点。外来说又有大食说与汉地说两种。

第一, 外来说: 大食说与汉地说。“本”起源于大食说的代表人物有本教大师夏察·扎西坚赞。他认为: 辛饶米奥切 (gshen-rab-mi-bo-che), 又称桑杰东巴辛饶米奥耿雷朗巴嘉瓦 (sangs-rgyas-ston-pa-gshen-rab-mi-bo-kun-las-rnam-par-rgyal-ba)。辛饶米奥切的父亲叫嘉本托噶 (rgyal-bo-thod-dkar), 母亲叫嘉谢玛 (rgyal-bzhad-ma), 辛饶米奥切生在奥茂隆仁 ('ol-mo-lung-ring) 的地方。关于奥茂隆仁这个地方, 夏察·扎西坚赞在他的《西藏本教源流》中根据《朵兑》(mdo-'dus) 这样解释的: 奥茂隆仁分自然地理概念的奥茂隆仁和宗教神话概念的奥茂隆仁两种, 无论是地理概念奥茂隆仁还是宗教概

念奥茂隆仁, 它们最显著的地理标志就是奥茂隆仁附近有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他进一步说地理意义上的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在西藏, 宗教意义上的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在大食 (古波斯), 因此, 辛饶米奥切的降生地奥茂隆仁在大食<sup>[1]</sup>。

关于辛饶米奥切的出生年代, 夏察·扎西坚赞没有明说, 只是说辛饶米奥切生于木阳鼠年的元月十五日破晓时分。但是, 从夏察·扎西坚赞对孔子、释迦牟尼、辛饶米奥切三位先哲生活年代的梳理情况来看, 他主张辛饶米奥切生活的时间略早于释迦牟尼。

“本”起源于汉地说的代表人物有满清帝师钵第教著名佛学家章嘉·瑞碧多杰 (1717 - 1786) 的高足图官·洛桑却吉尼玛 (1737 - 1802)。图官·洛桑却吉尼玛在其《宗教流派镜史》中以先师章嘉·瑞碧多杰的名义说: 老君与笨教主辛饶为一人, 汉语神仙 (hran-shed) 之“仙”藏语读音错讹, 遂呼为辛 (gshen) 也<sup>[2]</sup>。

其实, 本教起源于大食或汉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直接来自于教

收稿日期: 2011-05-15

基金项目: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1BZJ006)、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10YJA730012)、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一般项目 (SC10B003)、2011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 (11SZYTH0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同美 (1964 -), 男, 四川阿坝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藏本教研究中心教授。

派情结。比如本教起源于大食说,如果把冈底斯山及其周围地区看成是本教的圣地,那么由于人们可以到该地区参观,当信徒们发现该地区过于普通时,他们无法将该地区视为辛饶米奥切的降生之地,因为,这一现实性无法满足信徒的宗教情绪,他们宁愿选择一个神秘的、无人知晓的、哪怕是仅存在于精神世界的圣地。何况,长期以来藏人一直高度赞赏大食的古代文明,特别是面对印度佛教的传入,本教徒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地位,开始考虑他们的宗教绝不能起源于一个普通的地方。又如本教起源于汉地的说法,当印度佛教在藏地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印度佛教深邃的理论和藏地职业僧人优厚的待遇<sup>①</sup>使广大藏族职业僧人对印度文明崇拜得五体投地,同时也催生了严重的民族自卑心理,开始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模式:藏族知识分子的作品不如印度班智达的作品,只要是优秀的肯定是外来的<sup>[3]</sup>。大家知道,雍仲本是藏族本土宗教的最高形式,它的鼻祖是辛饶米奥切,是印度佛教传入藏地以前藏人唯一的信仰。图官·洛桑却吉尼玛及其他的老师章嘉·瑞碧多杰均为职业僧人,二者都有在北京生活的经历,见过大世面,当他们师徒面对东方古国文明的博大精深时不由自主地在汉文化中寻找藏文化的根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相对于其他职业僧人他们的机会更多。何况,道教的衰败时期正值清朝,鉴于当时师徒二人的政治抱负和所处政治环境的需要,为了巩固和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师徒二人无法顾及民族自尊心理,干脆从大乘佛教关于为芸芸众生解脱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口号出发,说一些违心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佛陀说过,只要是芸芸众生的解脱服务,其方法可以不限<sup>[4]</sup>。

第二,本教起源于本土说:源于冈底斯山及其周围地区。“本”起源于藏族本土说的代表人物有卡尔梅·桑木丹(1936—)。奥茂隆仁(vol-mo-lung-ring)是辛饶米奥切的降生地。卡尔梅·桑木丹在其《概述本教的历史及其教义》中对奥茂隆仁的地理位置是这样确认的“无论情况如何,根据经文对魏摩隆仁(奥茂隆仁)境内山川河流的描述,并以现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我们可以确定,河流从冈底斯山山脚下流

过,而这可能就是九迭雍仲山区。首先,冈底斯山是象雄最重要的中心,这符合本教资料中一些传说的提法。很有可能,本教以及与本教相似的宗教信仰也源于此。再者该地存留着用象雄语和藏语撰写的本教经文。而一些学者认为,象雄语是本教徒自创的一种语言。现代的拉达克、库纳瓦里及古老的西藏西部存有大量的象雄文的文献,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sup>[5]122</sup>关于辛饶米奥切的族别与生活年代,卡尔梅·桑木丹在该文中是这样论述的“在敦煌文选中,他(辛饶米奥切)的名字作为祭司至少被提到过五次。尽管他不是以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但他似乎是一位不可或缺的祭司,因为,他具有在生者与死者之间进行沟通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假定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人物,而且是藏族,他可能生活在公元7世纪以前。本教编年史证实其生活年代甚至早于佛陀。而敦煌文选的描述发展了传记文学的特点这一事实表明,他的生活年代要早于文选撰写的9世纪末10世纪初。因此,后来认为先饶(辛饶米奥切)是他们的宗教创始人的本教传说与公元八九世纪盛行的传说有某些直接关系。”<sup>[5]125</sup>

卡尔梅·桑木丹曾当选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主席,以其谦虚严谨的学术风范成为学界的楷模。既然卡梅·桑木丹博士认同辛饶米奥切降生于奥茂隆仁,奥茂隆仁在象雄地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依靠吐蕃王朝或者更晚的资料,而应该更加广泛地关注关于象雄王朝时期的所有资料,包括辛饶米奥切子孙后代在内的历代追随者以及与其相关的人物、事件、寺庙、文物、教义、教规等等。只有从多学科、多角度观察分析才有可能使我们研究的内容更加明朗、更加清晰起来。

## 二、多维视野下西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从东巴辛饶米奥切以来的历代本教代表人物的角度来看,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切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大家知道,丹增朗达先生(1926—)是曼日寺的著名导师,同时也是第一位与欧洲学者合作研究西藏本

① 吐蕃王朝时期规定七户供养一位僧人。

教的藏族本教职业僧人，早在公元1962年，他与英国大卫·斯莱噶瑞合作出版了《九乘本教》，首度向欧洲介绍了本教教义。2005年在尼泊尔出版了十二卷《曼日丹增朗达大师文集》。其中，丹增朗达大师通过厚实的古藏文献功底，详细梳理了本教内外密三大法脉传承系统的氏谱名单<sup>[6]</sup>。通览本教内外密三大法脉传承系统氏谱名单，自从东巴辛饶米奥切开始，本教代表性人物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大家熟知的历史名人，现选择部分人物译介列举如下，以资证明：1. 东索木曲丹朱（gdung-sob-mu-cho-ldem-drug）——辛饶米奥切与闍女贡珠氏（phy-bzvgung-drug）所生，辛饶米奥切的法脉第一继承人，先后把本教教义译成象雄文和藏文，相传中原老子曾拜其为师。2. 李西达仁（li-shu-stag-ring）——据克朱·隆朵嘉措的《智辩本教史》一书记载，李西达仁为东索木曲丹朱时期人，系象雄炎氏（gnyan）之王后裔女本教徒达维利维（bon-mo-stagwer-li-wer）所生，在世1200年。82岁时密修得道使其男身变为女身，先后赴大食多次，利用飞鹰（疑似鸵鸟）驮来11万卷显密大圆满经典传入象雄和蕃地，从而出现了37大寺院（vdun-gnas）、百位得道成就师之说<sup>[7]489</sup>。3. 泽赤耶西（rzdu-vphrul-ye-shes）——据克朱·隆朵嘉措的《智辩本教史》一书记载，泽赤耶西为李西达仁时期人，生于象雄玛（smar）域，此人大兴律宗，从此在阿里地区先后出现了亚公耶西嘉瓦（ya-gong-ye-shesrgyal-ba）、庞西巴基王修（pgam-shi-dpal-gyi-dbang-phyug）等观修略异的两大传承。其中亚公氏在桑桑拉宰（zang-zang-lha-rtse）地区兴建了29家寺院，庞西氏在冉萨雍仲若巴（ra-za-gyaung-drung-rol-ba）地区兴建了38家寺院<sup>[7]489</sup>。4. 六大上师（bia-ma-che-drug）——按姜珠南喀坚赞的《本教年鉴》记载，从第一代到第七代吐蕃赞普期间，著名的传法人士有“六大上师”说，这六大上师分别为：桑兑（sang-sv-dus）、达喇（stag-la）、拉（lha）、鲁（klu）、米辛（mi-gshen）、南喀诺东（nam-mkhv-snang-mdog）。所传之法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第一代赞普时期常提到的“十二本”以

外，还有无上父续本、无上母续本、无上乘本、无上行本、无上果本、无上胜义本等<sup>[8]</sup>。5. 十三世袭师（gdung-rgyud-bcu-gsum）——这里所说的十三世袭师分别为穆赤赞普（mu-khri-btsan-po）、哈冉基巴（ha-ra-ci-par）、达维勒维（sd-ag-wer-li-wer）、安尼昌塔（a-nu-phrag-thag）、塞尼高乌（sad-ne-gvu）、塔米塔盖（tha-mi-thad-ke）、西布冉库（shad-bu-ra-khug）、松瓦图庆（zing-ba-mthu-chen）、拜本图赤（spe-bon-thog-vphrul）、拜本图宰（spe-bon-thog-rtse）、申那木登（hring-ni-mu-ting）、松巴布喀（som-pa-sbu-kha）、隆庆木维（glang-chen-mu-wer）。据克朱·隆朵嘉措的《智辩本教史》一书记载，此十三世袭师在负责传播本波教义务的同时，还要充当当时当权者的精神导师“帝师”<sup>[7]490</sup>。6. 四智者（mkhas-pa-mi-bzi）——这里所说的四智者分别为象雄东炯图钦（stong-rgyung-mthuchen）、塞本夏锐乌钦（se-bon-sha-ri-dbu-chen）、氏本炯擦玛琼（lde-bon-gyim-tsha-rma-chung）、弭药杰擦堪卜（me-nyag-lce-tsh-mkhan-bu）。当时有通过意念传法、书面传法、口耳传法、翻译传法、掘藏传法、实修传法等六种传法渠道，他们主要通过翻译传法，先后生活于赞普七天王时代，即公元前一百年左右<sup>①</sup>。7. 世界六庄严（vjig-rtan-rgyan-drug）——本教徒认为，截至第二十一代赞普期间，藏族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史称“世界六庄严”的多国专家，他们为文化交流做出过积极贡献。他们分别是：波斯的五明学家牟杂扎海白（dmu-tsa-dra-he-pe）、印度的内明学家拉达阿卓（lha-bdag-sngags-dro）、中原的外明学家李聃名波（legs-tang-rmang-po）、昌的医学家瑟托杰姜（gser-thog-lce-vbyams）、象雄的语言学家佐民杰炯（tso-min-gyer-rgyung）、吐蕃的斯巴本专家朗然焦古（nam-ra-co-sku）。8. 詹巴南喀——公元8世纪生于象雄，为保护本教经典曾把不少本教经典改造为佛教经典<sup>[9]</sup>；9. 辛钦鲁噶（996—1035）——发现大量经文，本教的后弘期开始。10. 左钦·南喀雍忠（左家族）——建叶茹盆萨喀寺。11. 许叶勒波（11世纪人，许家族）——建吉喀日香寺。12. 班邓帕曲

① 参见江麦（Vjam-mq̄）：《漫话后四智者 sman-kyi-mkhas-pa-mi-bzivi-skor-rags-tsam-gleng-ba》，《本教法门 bon-sgo》1994年总第7期第62-73页。

(班家族)——密宗研究中心。13. 梅乌·阔巴班钦(1052-?)创建桑日寺——与辛氏无联系。14. 麦顿·西饶沃塞(1058-1132)对东巴辛饶米奥切训诫进行讨论。15. 年麦西饶坚赞(1356-1415)创建曼日寺。16. 达瓦坚赞(1796-1862)建雍忠林寺。17. 昆卓扎巴(1700-?)编撰本教大藏经《甘珠尔》目录,指导刻制木石《甘珠尔》印板。18. 尼玛丹增(1813-?)编撰本教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录。19. 夏杂·扎西坚赞(1858-1935)——夏杂·扎西坚赞认为,本波教与钵第教为主的藏传佛教各宗派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以实际行动在各宗派之间大力倡导“热麦 ris-med 观”。

第二,从藏医史料的角度来看,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切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当代藏医学家强巴赤列教授认为“在藏王聂赤赞普<sup>①</sup>时期,从十二位本教智者中‘资益药术’的职业与常松杰普赤西的历史来看,现在公认的藏医学有二千三百年的历史。”<sup>[10]1-2</sup>

常松杰普赤西(drang-srong-dpyad-bu-khri-shes)就是本教史上辛饶米奥切与胡女嘉美(hos-bzv-rgyal-med)所生的儿子。据相关本教文献记载,辛饶米奥切<sup>②</sup>至少与五个妻室育有八个子女。与胡女嘉美(hos-bzv-rgyal-med)生了多吾奔松(gto-bu-vbum-bsang)、常松杰普赤西(dpyad-bu-khri-shes);与蕃女唐莫(dpo-bzv-thang-mo)生了龙真桑瓦(luong-vdren-gsal-ba)、季真卓玛(rgyud-vdren-sgron-ma);与神女盎容(gsas-bzv-ngang-ring)生了奥珠唐波(vol-drug-thang-po);与阌女贡珠(phy-bzv-gung-drug)生了东索木曲丹朱(gdung-sob-mu-cho-ldem-drug);与工布女赤姜(kong-bzv-khri-lcam)生了雍中王丹(g. yung-drung-dbang-ldan);与汉女赤杰(rgya-bzv-vphrul-bsgyur)生了赤吾穷(vphrul-bu-chung)<sup>[11]</sup>。同时,长期以来,也有这样一批具有民族自卑心理的人,打着宗教情怀的美名,

妄自菲薄地极力鼓吹藏医学源自古印度的崇印媚外学说,整日为《四部医典》到底归《甘珠尔》还是《丹珠尔》争论不休。然而,20世纪80年代,卡尔梅博士、强巴赤列教授站在世界医学发展历史的高度,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全面审视了藏医学的起源与发展,充分肯定了藏医学独特的藏民族文化特性,从藏族医学发展历史的角度有力地回击了藏古文明外来说的错误观点<sup>[10]16-18</sup>。

第三,从古印度梵文佛经的藏译情况来看,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切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大家知道,早在公元1962年,英国大卫·斯莱噶瑞在《九乘本教》中指出:一方面,西藏本教与印度北方大乘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印度佛教入藏分几个阶段,7世纪以后印度佛教再次入藏并称之为“屈(chos)”是最后一个阶段,7世纪以前流行于象雄地区的主要是密宗且称之为“本(bon)”;另一方面,公元10到11世纪的本教已经具备古典式宗教的一般特点,与佛教没有本质不同。其实,有很多实例可以证明早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以前,藏语中早已存在不少与古印度佛教用语相对应的词汇,当时完全可以通过藏文意译,而不必像汉语那样只能音译的现象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具体地讲,汉语译音“达磨”的梵语,藏文转写为“thrm”,本意可归为规范、佛经、知识等,与其相对应的藏语文为“屈chos”,字面意思为知识或规范。汉语译音“佛陀”的梵语,藏文转写为“buddh”,本意为二障清净、二智圆满,与其相对应的藏语文为“桑杰sangs-rgyas”,其中“桑sangs”的字面意思为觉醒,“杰rgyas”的字面意思为开发。汉语译音“菩提”的梵语,藏文转写为“bo-dhi”,本意为应断诸垢永净,应证诸德全觉,与其相对应的藏语文为“祥曲byang-chub”,其中“祥byang”的字面意思为净化熟练,“曲chub”的字面意思为通晓。汉语译音“喇嘛”的梵语藏文转写为“gu-ru”<sup>③</sup>,本意

① 吐蕃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聂赤赞普生于公元前313年,见东噶洛桑赤列《东噶藏学大辞典》(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216页。

② 关于东巴辛饶米奥切的历史著作有《朵兑》、《赛米》、《瑟基》等,其中《朵兑》发现于10世纪,共计1卷21章。《赛米》共计2卷8章,11世纪的著作中有人大量引用了该书内容。《瑟基》12卷,据说14世纪通过神灵口述于罗丹林波(1360-?)其人。

③ 读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格日”相近。

为沉重，与其相对应的藏语文为“喇嘛 bla-ma”，其中“喇 bla”的字面意思为至高无上，“嘛 ma”的字面意思为母亲。这种例子在《声明要领二卷》<sup>[12]</sup>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又以象雄语与藏语关于佛教术语对应情况来看，以汉语译音“佛陀”一词为例，与之相对应的藏语文为“桑杰 sangs-rgyas”。然而，与其相对应的象雄语则为“穆桑 mu-sangs”，“穆 mu”的字面意思为天<sup>[13]</sup>。“天 gnam”在本教文化中具有很重要地位，与后来的法界法身佛等具有一定的关系。从佛教的教义来讲，“穆桑 mu-sangs”比“桑杰 sangs-rgyas”一词更确切、更能表现其内涵。总之，以上的这些现象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松赞干布前后，藏语文不仅具有非常广泛而厚实的术语基础，而且，从这些关键术语像古汉语一样没有必要音译而可以意译的事实也无不暗示着古代藏印文化之间共通性的普遍存在。反之，如果古藏印文化间没有这种共通性、对称性的存在，而像有些人所言梵语与藏语的差异如同丝绸与麻布<sup>[14]</sup>，那么在两种极不等势或极不对称的语言文化背景下，在短短近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很难通过刚刚面世的简陋文字较全面地翻译如此庞大而深邃的佛教经典。这也就是说，通过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辛饶佛祖弘法说、象雄文明起源说、松赞以前的前佛教说等学术观点既不是学界的凭空想象<sup>[15]</sup>，也不是广大藏人的自我吹嘘。

第四，从本教自身内涵发展变化的角度讲，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切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本教徒内部对本教有多种分类法，如四门一库说、九乘说等。有的人从历史的角度又把本教分为“原本 (bkv-rnying 或 gter-rnying)”和“新本 (bkv-gsar 或 gter-gsar)”两大类，即“原本”为本祖辛饶米奥切<sup>[16]396</sup>以前的原始宗教，又称远古人间本教 (srid-pa-rgyud-kyi-bon)， “新本”是指经过辛饶米奥切改良以后的神学宗教，又称雍仲本教 (G. yung-drung-bon)。关于本教自身内涵变化的文献记载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前后。大家知道，《斯巴基兑》 (srid-pa-spyi-stong) 是一本关于本教仪轨的书，南喀诺

布教授考证认为该书系公元7世纪以前的作品<sup>[16]339</sup>。《斯巴基兑》一书中明确指出，辛饶米奥切坚决反对牲祭，主张抑恶扬善，提倡以糌粑面塑“朵玛 gtor-ma”替代肉祭，以麦类酒液“伊德 yu-ti”替代血祭<sup>[17]7-12</sup>。这种习俗被藏区各宗教宗派普遍接受模仿使用并延续至今。14世纪，萨迦派大师绒顿·释迦坚参<sup>[17]179-191</sup>通过《本波教与钵第教辨析》一文，从比较学的眼光详细阐述了本教九乘学说的特点<sup>①</sup>。时至19世纪，一位学贯本教与钵第教的康巴汉子札东·格桑丹嘉 (1870-1931) 也写了两篇类似的文章。这两篇可以分别意译为《“本”与“屈”辨析》、《“本”与“屈”简析》。以《“本”与“屈”简析》一文为例，作者已经把“本”与“屈”视为“宗教”的同名词。如他在该文中指出“自世界形成以来，通往幸福涅槃的道路和指路人以及其追随者会出现很多，其道路归纳起来可以分善恶两大类，即源自众生造化和佛祖法力的善道，以及源自恶业与魔力的恶道两大部分。按古藏人的说法，从人类一般的表达方式来看，北部香巴拉 (sham-bha-la) 和南部马嘎达 (ma-khha-dhwa) 两地系佛教盛行之地。其中北部香巴拉及其相关地带盛行‘本’，南部马嘎达及其相关地带盛行‘屈’。”<sup>[18]90</sup>可见，札东在把“本”与“屈”视为“宗教”一词代名词的同时，把“本”与“屈”视为佛教在南北两个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的不同表现，并从藏文化视野下对“本”与“屈”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即从藏文化的视角对“本”与“屈”做了分类阐释。

这里我们要明确这样一点，在本波教那里宗教被称作“本”，在钵第教那里宗教被称作“屈”。换言之，“本”与“屈”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本”与“屈”分别内分善恶 (或正邪) 两大类八小类。狭义的“本”与“屈”特指正见部分，即当今所谓的藏传佛教部分，也就是说，指“正见本”和“正见屈”共同构成的略别于其他佛教的藏传佛教。“正见本”和“正见屈”内部又各分三大类。本波教所谓的正见“本”分别传自辛饶米奥切的雍仲本、奇美奏普的正道密本、耿德桑波的极乘本等三大部分；钵第教所谓的正见“屈”分别传自

① 其提要译文详见“西藏本教是藏传佛教最典型的代表”，《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2期。

释迦牟尼的正确高尚屈、金刚持的特别密屈、普贤的深道圆满屈。按札东在《“本”与“屈”简析》中的说法,“本”作为当今宗教一词,从整个藏区而言,在斯巴本、邪见外道本、野蛮原始本、神鬼本、杜撰自创本等五大类中,除了斯巴本以外其余这样或那样“本”大多见于藏土以外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本教文化视野下,斯巴本是指辛饶米奥切降世之前由耶钦莫美乌噶(ye-mkhyen-smon-mi-dbu-dkar)等所传之内容,主要包括占星术、禳解术、医疗术、历算术等<sup>[18]102</sup>。

少数非本教徒又分本教为“黑本(bon-nag或chab-nag)”和“白本(bon-dkar或chb-dkar)”两类。公元12世纪一位人称尼丹贡波<sup>①</sup>的曾提出本教的发展经历了“突本(brdol-bon)”、“流本(vkhyr-bon)”、“译本(bsgyur-bon)三大阶段。按图官·曲杰尼玛<sup>[19]</sup>的解释:“突本”意为涌现本,指本土产生的本教;“流本”意为混杂本,指受来自克什米尔、勃律、象雄等地的大自在天流派影响而形成的本教;“译本”意为翻译本,指古印度佛教传入藏土以后,经过钵第教和本波教之内的斗争,由本教徒篡改钵第教典而形成的本教<sup>[20]</sup>。石泰安根据这位12世纪神学家关于本教发展三段说,进一步分析认为“突本”、“流本”、“译本”三阶段依次出现于聂赤赞普、智公赞普以及墀松德赞前后,即上至公元前三百多年以前,下至公元8世纪以后<sup>[21]</sup>。

第五,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构成四要素的角度讲,藏民族的形成历史就是西藏本教的形成历史。然而,纵观藏族历史各个时期藏民族的活动区域均有所不同。以现今西藏阿里为中心的古象雄王朝时期为例,历史上所谓的象雄分里、中、外三圈,每圈又分上中下三部,共计九个区域。虽然每个历史阶段象雄的地理界域和行政归属都不确定,但是,象雄界域西接大食东接中原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就现在藏区东部松潘、九寨沟等地的河名地名而言,其中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古代象雄历史的印记。如九寨沟一带地名历

史上汉语称“羊峒”<sup>[22]</sup>。流经松潘县元坝乡东北村的东北沟的大河是岷江源之一,历史上汉语称“羊峒河”<sup>[23]</sup>。松潘热务沟藏语叫“象恩zhang-ngu”,有人认为“象恩”是藏文“象雄zhang-zhung”一词草体简写的读音。“羊峒”就是藏语“象雄”的古汉语转写,汉籍还有“大羊同”、“小羊同”的记载,这些都是象雄王朝大统一时期的地名。当代藏学大师东噶洛桑赤列先生说“大致到了公元6世纪,随着雅砻吐蕃王朝的崛起,象雄李米夏王朝被吐蕃所灭,过去广袤的象雄萎缩到古格(今在阿里地区札达县)、琼龙欧喀(噶县门土乡)等地区并成为了吐蕃王朝的辖区之一。”<sup>[24]</sup>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藏裔意大利藏学家南喀诺布教授撰写了几十万字的《古代象雄与吐蕃史》<sup>[25]</sup>,通过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毫无疑问地肯定了藏族历史上象雄王朝的真实存在,全面地勾勒了象雄王朝的历史,详细梳理了象雄与吐蕃之间的历史渊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在他的《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把象雄文明置于波斯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更大的文化圈之中,通过丰富的外文资料肯定了本教文献关于象雄历史记载的学术价值,梳理了象雄与波斯之间的关系<sup>②</sup>。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过去大家对历史上是否存在象雄文字持怀疑态度,随着古格王朝城堡遗迹壁画中象雄文字的发现,人们更加重视藏文古籍中有关象雄语文的记载。2003年Yasuhiko Nagano Samten G. Karmay编辑出版了《A lexicon of zhang zhung And Bonpo Terms》一书,该书通过象雄文、吐蕃文、英文等三文互释的方式,对象雄文化做了具体的介绍。同样,2008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第76期的名义,出版了由Yasuhiko Nagano Samten G. Karmay主编的象雄语词典《A Lexicon of zhang zhung and bonpo terms》,该词典共收集象雄语单词3000余条。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不久前四川大学考古系对西藏西部做了考古发掘,部分成果在第十一届国际藏学会(德国波恩)古代组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西藏

① 尼丹贡波系直工噶举派创始人,1143年生于朵康,1171年在现西藏墨竹工卡县境内建直工梯寺,1217年去世,现存其文集五函。详见《智者喜宴》(藏文),巴沃祖拉陈瓦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1341页。

② 考古证明西藏文明不可能是孤立的单元的,恰恰相反西藏文明是多元的、是广泛联系的。详见《西藏考古》G·杜齐著,向红茄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西部考古学探索的报告认为,至少在几千年前,当今西藏的西部,也就是历史上所谓象雄的中心地带的确有过一段人口密集、文明相对发达的时期。

第六,从汉藏文化关系的角度讲。藏古文献中常见的汉族本教徒名字有“hor-ti”、“legs-tang-rmang-bo”、“kong-tse-vphrul-rgyal”、“zing-ba-mtu-chen”等。经笔者研究认为,以上所谓的汉族本教徒,其原型分别为黄帝、李聃名尔、仓颉、宋任公<sup>[26]</sup>。据此,笔者认为辛饶米奥切生活于公元前500年以前。又如以藏东岷江上游地区为例,本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远古时代。霍巍博士在《西藏考古新收获与远古川藏间的文化关系》一文中指出“西藏和四川自远古时代始,便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仅未曾间断,并且不断得到发展,为唐以后西藏与四川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27]</sup>正如近些年岷江上游考古发现所证明的那样,从本教文化的角度也能证明岷江上游是连接川藏的重要通道。向达先生说过“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氏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于老子五千文。”<sup>①</sup>特别是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文物中也能找到早期本教斯巴本的痕迹。大家知道,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解读“青铜神树”、“太阳神鸟”等远古文明所象征的蕴义。然而,只要我们尝试通过本教文献资料给予解读,则完全可以使人耳目一新。本教有

一本很古老的祭祀用书,书名叫《夏娃日吉基杜》(sha-ba-ru-rgyas-kyi-mdos)。该书认为,世人是由王、臣、民等三类人构成,人死是因为灵魂被魔鬼偷走<sup>[28]</sup>。同时还认为,通过送“儡glud”的祭祀活动可以招回被偷走的灵魂,其中通过鸟可以招回“王”魂,通过树可以招回“民”魂,通过鹿可以招回“臣”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青铜神树”其实与人的灵魂有关。同样,《夏娃日吉基杜》一书在谈到鸟、鹿、树为什么可以招魂时,认为黑夜代表恶,白昼代表善,鸟鸣预示天亮,太阳带来光明。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太阳神鸟”其实与善业有关。又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虚线)的十三个光齿以及青铜立人的十三根发髻,分别与斯巴本的十方三时观念有关。

###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历史的角度讲,在遥远的古代,本教的历史其实就是藏民族的文明史,藏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其实就是本教的起源与发展。因此,本教与藏民族一样无疑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犹如随着历史的变迁藏民族氏族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一样,本教内部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藏民族地处古伊朗、古印度、古中原等诸多文明的中心,本教深受周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 参考文献:

- [1] 夏察·扎西坚赞. 西藏本教源流(藏文)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10.
- [2] 图官·洛桑却吉尼玛. 宗教流派镜史 [M]. 刘立千, 译. 王沂暖, 校. 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 1980: 203.
- [3] 恰白·次旦平措. 格敦群培著作: 第一卷(藏文) [M]. 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90: 4-5.
- [4] 昂旺·贡噶索南. 萨迦世系谱(藏文)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174.
- [5] 图齐, 卡尔梅桑木丹, 等. 喜玛拉雅的人与神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向红笳, 译. 2005.
- [6] 曼日丹增朗达大师文集: 第四卷(藏文) [M]. 尼泊尔. 31-72.
- [7] 才让太. 冈底斯雍仲本教文献: 第一卷(藏文)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 [8] 姜珠南喀坚赞作品选集(藏文) [M]. 八宝图出版社, 2009: 466.
- [9] 格桑达尔基大师文集(藏文)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9: 59-56.
- [10] 强巴赤列. 中国的藏医 [M]. 江平, 主编. 郑堆, 等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 [11] 禅巴朗卡, 等. 苯教史料汇编(朵兑) [M]. 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 23.
- [12] 旁塘目录: 声明要领二卷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60-204.
- [13] A Lexicon of zhangzhung and bonpo Terms [Z]. Bon studies11, Pasar Tsultrim tenzin changru tritsuk namdak Nyima Gatsa Lodroe Rabcal, edited by Yasuhiko nagano Samten G. Karmay. 184.
- [14] 康珠·丹增曲吉尼玛. 诗经注释妙音戏海(藏文) [M]. 拉萨: 西藏出版社, 1986: 538.

① 转引自卿希泰《道教在巴蜀初探》, 见《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

- [15] 禅巴朗卡, 等. 苯教史料汇编(全传) [M]. 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 228, 231.
- [16] 南喀诺布选集(藏文)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 [17] 赞拉·阿旺措成论文集(藏文)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
- [18] 札东. “本”与“屈”简析[C]//本教大藏经: 甘部.
- [19] 洛桑却吉尼玛. 宗教源流史 [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4: 380-383.
- [20] 夏察·扎西坚赞. 西藏本教源流(藏文)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238.
- [21] 石泰安. 西藏的文明 [M]. 耿昇, 译, 王尧, 审订.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309.
- [22] 松潘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松潘县志 [M]. 2007: 451.
- [23] 松潘县志地图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9.
- [24] 东噶洛桑赤列. 东噶藏学大辞典(藏文)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1762-1763.
- [25] 南喀诺布. 古代象雄与吐蕃史(藏文)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 [26] 同美. 论汉文化对西藏本教的影响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 (6).
- [27] 霍巍.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272.
- [28] 同美. 西藏本土宗教“本”的语言学解读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8, (6).

##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Tibetan Bon Religion from Multi-perspectives

TONG Mei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s:**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Tibetan Bon religion not only involves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ubo Dynasty and later times, but also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materials of the Xian-xiong kingdom period, including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scendants of Gshen-rab-mi-bo-che and his other followers, as well as about relevant historical events, temples, antiques and Bon teachings. Only from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an scholars come up with insightful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Bon religion.

**Keywords:**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Bon religion in Tibet; origin and evolution

(责任编辑: 知 恕)